

【珍藏版】

跟

毛泽东
学史



红旗出版社

薛泽石

主编

跟毛泽东学史

(下)

毛泽东

红旗出版社

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



毛泽东评述批注原文

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摘自毛泽东读《初唐四杰集》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1页）

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6页）



李贺传略

李贺（790~816年），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县）人。唐皇室远支。因避家讳，不得参加进士科考试。怀才失意，不幸早逝，年仅27岁。其诗远本《楚辞》，旁涉汉魏六朝乐府，善于驾驭神话传说，想象奇特，意境幽秘，措辞诡诞，设色绚烂，极富浪漫气息。在唐代众多诗人之中，他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被称为“鬼才”。曾自编诗集，共四编，收诗223首。由于其作品比较难读，从宋至清便有十数种注本。南宋吴正子《李长吉歌诗笺注》最古，此后有姚文燮《昌谷集注》、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等。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王琦

《汇解》本为主，附录姚文燮的《集注本》、方扶南的《批注》本，加以断句，名为《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还出版了叶葱奇的《李贺诗集》，该书以王琦《汇解》本为主，参照其他诸家做了订正、增补和注解。



学习参考

毛泽东在他读过的《新唐书》第230卷《李贺传》的天头上标写着“李贺”两个醒目的大字，在记载李贺写诗“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等处，逐句加了旁圈。

1965年7月，毛泽东曾向陈毅推荐李贺的诗，说：“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在有关王勃的批注中，毛泽东亦曾提及李贺，赞扬他是“英俊之才”，惋惜他的早殇。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收藏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等。翻开这些书，每本都有毛泽东的圈画。在李贺流传于世的240首诗中，经他亲笔圈画的计有83首，部分作品甚至圈画多至四五遍。他还圈画过《新唐书·李贺传》及《李长吉歌诗集·杜牧序》。

李贺的诗富于想象，这与毛泽东浪漫主义的气质正好吻合。这也是毛泽东喜欢李贺诗的重要原因。李贺写诗呕心沥血，创作态度极为严肃，他广泛吸取前代诗人的艺术传统，另辟新路，独树一帜，形成自己奇峭瑰丽的诗歌风格。他敢于把犀利的笔锋，直指中唐时代腐朽社会的代表藩镇和宦官，敢于撕开其阴暗帷幕，有较高的思想性。

他的作品主要有神怪、讽喻、抒情三大类。神怪诗虽只有十来首，但却占李贺名作的一半以上，因而李贺有“诗鬼”之称。毛泽东很喜爱李贺的这类作品。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中《梦天》一首天头上的编者评语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毛泽东读至此，每句都圈点断句，很重视这一评语。对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李凭箜篌引》、《巫山高》、《湘妃》、《天上谣》、《梦天》、《官街鼓》等，毛泽东圈画较多。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他都化入自己的创作之中。

毛泽东读李贺的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读得非常精细，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其中有一首《湘灵歌》，是鲁迅于1931年3月5日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郎的。全诗

为：“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茎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琴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毛泽东在该诗末句旁边批注道：“从李长吉来”。李贺在《自昌谷到洛后门》一诗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之句，足见毛泽东对李贺诗的熟悉程度。



文献记载

梦 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毛泽东评述批注 唐代事件

庞勋起义因内部分裂而败亡



毛泽东评述批注原文

徐州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

内部分裂，因而败亡。

——毛泽东读《新唐书·康承训传》
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第244页）



庞勋起义记略

唐懿宗统治时期，政治极为腐败，唐王朝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咸通三年，徐州武宁军节度使麾下的“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发生兵变，逐走了节度使温璋。事后，唐政府对徐州的叛兵进行了残酷镇压，杀死了以“银刀”军都将邵泽为首的数千人。

为了防止“土风雄劲、甲士精强”的徐州再次发生兵变，同时也为了抵御南诏的入侵，唐政府下令在徐州招募了数千士兵，南下参加对南诏作战。其中，有800名士兵负责防守桂林（今广西桂林）。唐政府与他们约定：三年期满后便让他们换防，返回徐州。

三年期满后，桂林戍兵多次请求返回徐州，与家人团聚，但他们的顶头上司徐泗观察使崔彦增却以军费空虚、远距离换防困难为由，要求戍兵继续戍守桂林，直到咸通九年（868年），还不放他们回家。已经在桂州驻守了六年的戍兵们怒不可遏，群情激愤。七月，都虞侯许信以及军校赵可立等九人趁机发动戍兵哗变，杀掉了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勛做首领，率领戍兵北还。他们且战且行，沿途州县，莫能抵御。

九月，庞勛率戍兵渡淮北上，相继攻陷了宿州和徐州，占领了附近的大片地区，囚禁了徐泗观察使崔彦增。庞勛自称兵马留后，一面向朝廷上表，请求唐朝封他为节度使；一面大量招募士兵，扩大自己的武装。原先逃亡的士兵和广大饥寒交迫的农民纷纷投到庞勛的旗帜下，出现了“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鋤首而锐之，执以应募”的动人景象。庞勛的队伍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发展到了20万人，哗变戍卒的队伍转变成了农民起义的武装。起义军迅速攻陷了濠州（旧治在今安徽凤阳东）、滁州（治今安徽滁州）、和州（治今安徽和县）、丰县（今江苏丰县）、鱼台（今山东鱼台）等州县，声势大振。

同年十一月，唐王朝指挥重兵，从南北两路征讨庞勛。咸通十年（869年）九月，庞勛战死，起义军主力全军覆没。庞勛起义遂告失败。庞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为五年后爆发的黄巢大起义积累了经验，埋下了革命的火种，成为黄巢大起义的前奏曲。



学习参考

《新唐书》卷148《康承训传》对庞勛起义有较详细的记载。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新唐书·康承训传》，作了两条批注。一是：“徐州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二是：“内部分裂，因而败亡。”前一条批注，点明了庞勛起义爆发的原因；后一条批注，则是对庞勛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后一条批注，与前一条批注相呼应，显得尤为精当。

庞勛起义正因为是出于“徐州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起义的准备并不充分，因而庞勛等人只能用“杀人放火受招安”来鼓动七百戍兵哗

变。由于这种局限，因而在起义之初，当七百戍兵一路剽掠，回到徐州城下时，由于唐王朝指示徐泗观察使崔彦增“抚慰戍卒擅归者，勿使犹疑”，七百戍兵面临朝廷的招安，对是否继续对抗朝廷的问题就已有了分歧。赵武等12名将士不愿参与起义，打算逃跑，结果被庞勋处死。这件事使庞勋起义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分裂的阴影。

当哗变戍卒的队伍转变成了农民起义的武装后，原七百戍兵的领导者内部又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起义军大将孟敬文多谋善断，兵强马壮，但野心勃勃。当他率军攻占丰县，便滋生了背叛庞勋、自成一军的打算。于是，他在暗中散布符谶，说自己有天命，为背叛做舆论准备。庞勋对此也有耳闻，因而对孟敬文的一举一动尤其留意。当唐将薛尤率魏博军进攻丰县时，庞勋趁机派亲信率兵三千赶到丰县，名义上是帮助孟敬文守城，实际上是对孟敬文进行暗中控制。孟敬文对庞勋此举心照不宣。孟敬文暗中设计，与庞勋的亲信约定共击魏博军，并大肆吹捧庞勋的亲信，说他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能战，支使他担任前锋。等两军交锋时，孟敬文却引兵退走，致使庞勋亲信全军覆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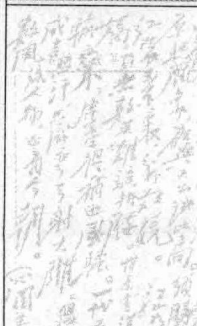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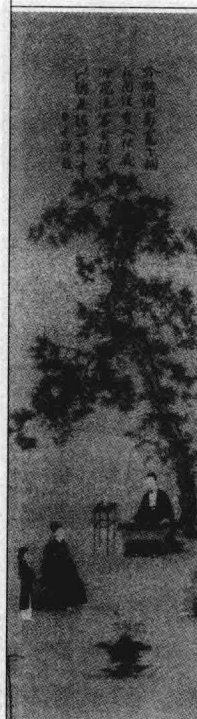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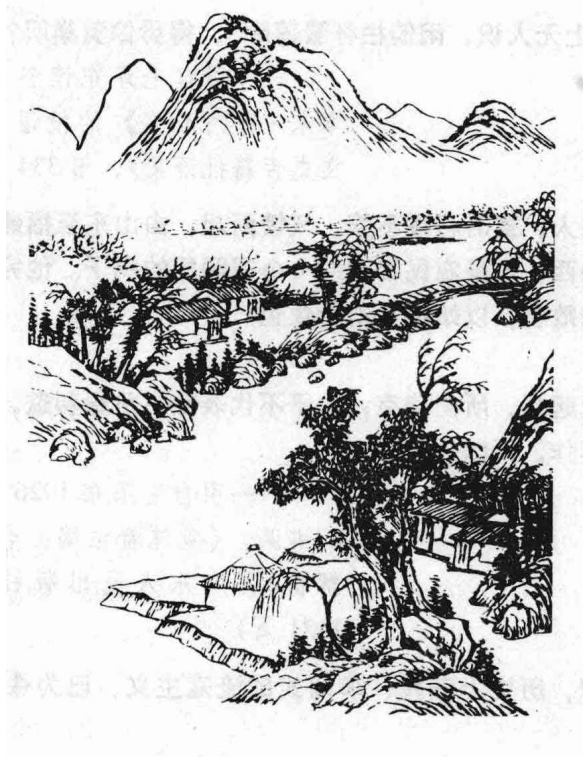
庞勋大怒，派人去诱骗孟敬文，说王弘立已经攻取淮南，庞勋现打算前往淮南坐镇，因此想从诸将中挑选一名骁将，镇守徐州。孟敬文利欲熏心，为了争取到镇守徐州的机会，他没有来得及多想，便立即上马赶往徐州。庞勋于是将孟敬文抓了起来，砍了头。孟敬文一死，无疑削弱了起义军北线的防御力量，使战场形势朝有利于唐军的方面转化了。

姚周也是庞勋起义军的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但却与防守宿州的起义军将领梁丕素来不和。因而，当姚周在柳子城与康承训所指挥的唐军主力血战时，梁丕却不发兵增援。柳子城作战失利后，姚周与数十人突出重围，逃往宿州。梁丕开门让姚周进入宿州城后，便丧心病狂地杀了姚周。事后，庞勋将梁丕贬职，而改任张玄稔负责宿州防务。

张玄稔原为徐州旧将，起义军攻入徐州后，他被迫参加了起义军。当康承训指挥唐军围攻宿州时，他见势不妙，便接受了康承训暗中招降，杀掉了起义军守将张儒等人，献出了宿州。张玄稔在投降唐军后，还带领人马，谎称是从宿州突围而来，骗开符离城门，使唐军兵不血刃便得到了符离。接着，他又引着唐军进攻徐州，并配合唐军攻城，致使徐州失陷。当庞举直、许佶率众突围后，张玄稔竟亲自带兵追杀，杀了庞举直和许佶。由于张玄稔的叛变，庞勋起义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张玄稔因镇压庞勋起义有功，最后被唐王朝加封为右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

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对队伍的内部团结非常重视。因而，他在读《新唐书·康承训传》时，庞勋起义军内部的这些矛盾和分裂因素自然也就

引起了他的注意。毛泽东在对庞勋起义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认真分析后，认为庞勋起义的失败并不在于唐军能战，而在于起义军的内部分裂。因此，他以“内部分裂，因而败亡”八个字，对庞勋起义失败的原因作了精辟的概括总结。（杨倩描）



黄巢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



毛泽东评述批注原文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

——引自毛泽东读谷永泰《明史纪事本末·平河北盗》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34页）

黄巢山东人，当时科举不第，气愤而起，由山东至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西，这是农民暴动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其所以失败者，以始终暴动所致也。

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所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所以失败了。

——引自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的讲课，（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1页）

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引自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5页）



黄巢起义记略

唐懿宗咸通年间，由于藩镇军阀混战，灾荒连年，再加上朝廷繁重的赋役剥削，黎民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名叫黄巢。他自小练就一身骑马射箭和击剑的好武艺，精通书传，写得一手锦乡诗赋，又好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曹州一带百姓一提黄巢的名字，无人不晓。

乾符二年（875年）六月，黄巢率领兄弟黄揆、黄思邈等数千人响应王仙芝起义。王仙芝与黄巢等豪杰对天盟誓：齐心协力，横行天下。

乾符三年七月，王仙芝、黄巢攻沂州（今山东临沂）失利，转入河南。没过几天，起义军在河南复起，顺利攻占了阳翟（今河南禹县）、郟城（今河南郟县）、汝州（今河南临汝），汝州刺史王镣被擒投降。他们喜欢流行作战，奔向大城市，许多城池，随得随放弃。这虽然使起义军能灵活机动，避开藩镇的联合围剿，向有利的地方进军，创造了轰轰烈烈的业绩。但也导致了严重的流寇主义，最终陷入失败。毛泽东评说为：其所以失败者，以始终暴动所致也。

广明元年（880年）五月，黄巢全歼淮南节度使高骈所部精锐，乘胜由采石渡江。高骈畏怯，不敢出战。各藩镇“望风瓦解”，“敛兵退缩”。十一月，起义军直指洛阳。黄巢以“天补大将军”的名义，警告各地藩镇：“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接着，起义军攻克洛阳。十二月，攻占潼关，直逼长安。田令孜偷偷挟持皇帝逃往四川。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初，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百官数十人到灞上迎降。黄巢乘金装肩舆，农民军皆以红绶束发，剑戟如林，金甲耀日，旌旗蔽天，骑士如流，浩浩荡荡，开进长安城。长安百姓夹道欢迎。几天后，黄巢称皇帝于含元殿，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宣布：唐朝三品以上官全部停任，四品以下留任。唐朝宗室、王侯、公卿一律要向新政府自首登记，隐匿躲藏者处死。

唐皇跑到成都，喘息刚定，就调动各地武装进攻农民军。凤翔节度使郑畋收集关中禁军九万，首先与农民军为敌。代北监军陈景思募得三万彪悍善战的北方杂胡，勾引沙陀贵族李克用为统帅，也杀气腾腾奔向长安。黄巢与各路唐军展开殊死搏斗，长安几度得而复失，兵源、粮秣的供给基本断绝。紧要关头，起义军的同州防御使朱温叛变降唐。中和三年（883年），处境



黄巢

险恶的黄巢被迫退出长安，转战于河南、山东一带。在李克用的追杀下，黄巢连战失利，中和四年（884年）六月，人困马乏的黄巢被困于泰山狼虎谷，壮烈自杀，起义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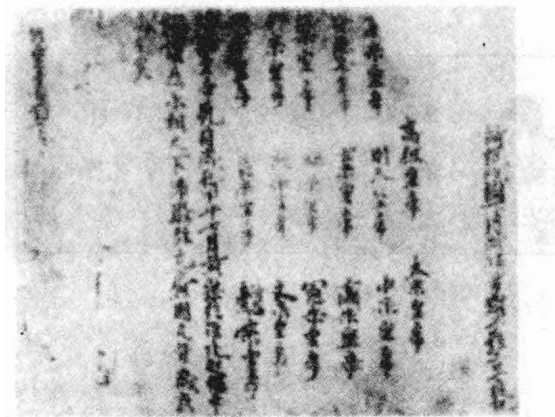
学习参考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英勇奋战了十年，转战数万里，席卷大半个中国，战斗的足迹踏遍今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十二个省。其规模不仅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也是世界农民反封建斗争史上所少见的。其原因是唐后期封建土地占有形态发生了变化。唐前期均田制的实施给自耕农经济的发展留下了一点活动的余地，到实行两税法时，均田制完全被破坏，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态，地主庄田迅速扩展，广大农民群众则沦为“佣力客作”的佃农和半自耕农。佃农和半自耕农有不同程度的个体经济，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地减轻，失去土地后渴望土地的要求表现得更加强烈。农民阶级反封建的斗争已由要求减轻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深入到土地所有制这个核心问题。随之，农民战争也就进入了新阶段，表现得空前激烈。

黄巢领导的农民革命军，发挥了空前的威力，北自黄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地主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经过这次农民起义以后，南北朝以来在社会上起着支配作用的门阀制度和观念被基本清除了。最突出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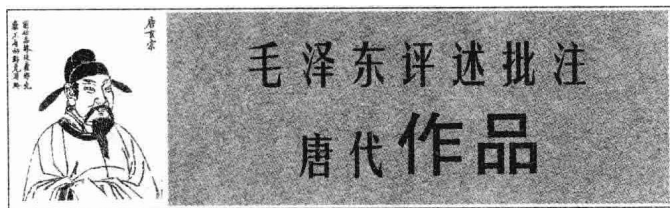
是从五代开始，“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就是唐末农民战争的伟大功绩。唐末农民大起义，还使旧的藩镇势力在大起义以后，逐渐衰弱，以至消灭，而唐王朝本身则也名存实亡了。

唐末农民起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唐王朝和藩镇割据势力、沙陀军事贵族的反动联合而被镇压下去，它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唐人所书黄巢起义事迹墨迹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前期执行了比较正确的战略和战术。但是，在占领长安以后，他们没有乘胜追歼以唐僖宗为首的地方统治集团的残余力量，没有及时组织军事力量向藩镇割据势力进攻，而是坐失时机，使唐王朝得以重新纠集各种反动势力，卷土重来，从而导致政权的丧失。另一方面，起义军在进军的过程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法，打垮了不少顽敌，驰骋在祖国南北各地，然而在所到之处都未能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以支持仍在进行中的革命战争和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尤其是起义军进入长安建立政权以后，仍然只停留在长安周围的狭小地区内，致使唐王朝能在全国各地纠集各种反动势力，重新造成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从而集中兵力，围攻起义军，而起义军则陷于被动应付，终于避免不了失败。黄巢农民军的失败，又是与朱温之流叛变革命，从内部分裂起义军的力量分不开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朱温叛变降唐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是农民革命留下的宝贵财富。（谢天佑 简修炜）



《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



毛泽东评述批注原文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作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即《六祖坛经》——引者注）就是劳动人民的。

——摘自甄不贾：《毛泽东谈佛论禅》

（见《希望》1992年新总第2期）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

寄托，大为流行。

——摘自毛泽东 1958 年 8 月 2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见王兴国著：《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2 页)



《六祖坛经》述略

《六祖坛经》，亦称《坛经》。“六祖”指禅宗南宗开创人慧能。此文献记录了慧能的行迹及语录。已知的《坛经》有十几个本子，一般认为真正具有代表性及独立性的只有四种。这四种类型的《坛经》为：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改编本、宗宝本。法海本为现存最古老的本子，但真正的古本，即慧能在韶州大梵寺说法时其弟子所作的原始记录，今已无从得见。法海本亦即敦煌本和伦敦博物馆藏本。惠昕本为中晚唐僧人惠昕改编过的本子，即题为《六祖坛经》；契嵩改编本于北宋时出现（约 1056 年），有说即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宗宝改编本则完成于元代（1291 年），题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估计《坛经》出现于六祖慧能去世后 50 年中，即 8 世纪中叶。随着禅宗流行发展，本来组织就很松散的禅僧为了扩大影响，一再改编《坛经》。

从现存的本子内容来看，《坛经》是南方的禅宗发展成熟的结果。它包含了三个部分：一、慧能在广东韶关大梵寺的说法，这是禅宗思想的主体。它包括了慧能对于僧俗两众的公开说法、传禅及授戒的内容等，也就是在大梵寺登坛说法和授无相戒的这一部分。二、慧能的生平简历和背景。三、平时与弟子们机缘交接时的语录，慧能的嘱咐语。这是有关佛法的问答。三者当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第一部分。所有不同的《坛经》本子分量虽有差异，但第一部分是基本一致的。第一部分也是形成最早的。学者研究，第二部分大致与第一部分同时，各本子差异最大的也就是第三部分。第一部分中的内容也就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及“授无相戒”。前者也就是“我此法门，定慧为本”引出的一行三昧、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坐禅等一大套授禅法实践。其次是“总须自体，与授无相戒”下所说的于自色身皈依三身佛，发四大宏愿，无相忏悔和无相三皈依。无相戒是慧能所独有的大乘戒法。第一部分中的两大内容在不同本子《坛经》中是稳定的。

通过不同《坛经》本子内容上的差异，正好揭示了禅宗发展过程中的思想轨迹，各支派的历史演变。例如敦煌本中有慧能在讲堂中升高座说法的礼仪记录，这就反映了本来处在山野林间的禅僧，已经成为了官方接受并支持的一个佛教宗派。因为以往神会只是“设坛讲法”，而无住也只是“严设道场，高座说法”。有“讲堂”已经是禅院内有相当规模后的事了。从《坛经》中可以看出早期南宗的一定仪礼，如慧能说法时的情形：“能大师言，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师不语，自身净心。良久乃言……”以往在讲经前多为念佛以求静心，这里则是口诵摩诃般若，显示其宗旨本来就般若慧为归依。《坛经》中还显示了禅寺中的行事仪则，如说法时，先为听众授“无相戒”，令其“归依三身佛”，“发四弘誓愿”，做“无相忏悔”，最后又是颂“无相偈”。总之，规范化了的说法仪则——净心、说法、授戒、归依、四弘誓、忏悔、作偈颂——说明了禅宗的制度化过程。

再从思想内容上看，《坛经》涉及了禅宗的根本理论和实践。这就是各家版本一律遵奉的宗旨：无念、无相、无住。《坛经》中最为基本的思想都在大梵寺说法中，也就是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顿悟菩提等。慧能的教旨是要求习禅者在不刻意追求觉悟与解脱的自然状态下，明心见性，顿入佛地。慧能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对《金刚经》的心解，《金刚经》上就说智慧般若与法空不二，其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更是对慧能“三无”的直接启发。因之《坛经》中特别突出了《金刚经》的地位。《坛经》中这种强调不依赖外在力量而返求自身内在的修行方式和认识途径，简化了佛教徒获得觉悟、达致成佛的过程和阶次，成佛的依据——佛性，成佛的工具——般若智和成佛的结果——菩提，完全是同一性的。这种理论如果推到极致，将会产生强大的批判力。无论是对后来佛教中思想家，还是对于教外的改革家，禅宗的思维方法和自我扩张的大无畏精神，始终是思想创造的动力和源泉。这也就是禅宗和《坛经》在中国历史上深受士大夫欢迎和欣赏，并在中国思想史上得以产生持久而强大影响的原因。（黄颂一等）



学习参考

毛泽东 1959 年 10 月 22 日在接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的谈话时认为，《六祖坛经》是劳动人民的，这应该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据专家分析，毛泽东这一说法的根据之一，可能就

是因为慧能是劳动人民出身。

慧能少时家贫，曾卖柴为生。据《坛经》记载，他自己说过：“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慧能是通过卖柴了解弘忍说法，而因往黄梅冯墓山参拜弘忍和尚的。慧能见弘忍大师之后，“忍大师山中门徒至多，顾盼左右，悉皆龙象，逐令能入厨中供养，经八个月。能不避艰苦，忽同伴戏调，巍然不以为意。忘身为道，仍踏碓，自嫌身轻，乃系大石著腰，坠碓令重，遂损腰脚，忍大师因行至碓米所，问曰：‘汝为供养，损腰脚，所痛如何？’能答曰：‘不见有身，谁言之痛。’”（《曹溪大师别传》）慧能碓米时因身体太轻，于是在腰上系一大石以增加重量，遂导致腰脚损伤。郭朋则指出，在佛教各宗的创始者当中，家境贫苦、出身寒微的，也只有慧能一人。大概正是因为慧能出身的这种“与众不同”，所以毛泽东把《坛经》称之为“劳动人民”的。

毛泽东说《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的另一根据，可能就是肯定慧能佛性论中的平等思想。

所谓佛性论，就是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本来，中国佛教除三论宗和唯识宗外，其他各宗都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顿悟”成佛却是慧能的独创。慧能不仅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且突出强调下层人民成佛的可能性。

据《坛经》记载，当慧能第一次去参拜弘忍时，弘忍问他：“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慧能答：“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弘忍责慧能：“汝是岭南人，又是獠，若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獠”是当时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慧能的回答表明，他认为“佛性”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均等地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又如惠昕本《坛经》在记述慧能请“别驾”为他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的偈时，别驾对他说：“獠！汝亦作偈，其希有！”慧能答曰：“若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俗谚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慧能这种“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劳动人民的重视和替劳动人民在文化领域争地位的思想，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